

晚清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性别话语及其社会文化意蕴*

张素玲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领导研究院, 上海 201204)

关键词: 民族主义; 性别; 性别话语

摘要: 本文主要从性别分析视角, 通过梳理晚清至五四运动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 揭示女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探讨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如何被不断建构, 从而展现性别化了的历史图景。文章认为性别的变化并不只是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 女性是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被纳入到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的, 民族主义一直是性别表述的主旨, 同时, 女性形象的变化也与精英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紧密相关, 性别变化背后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D 442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07)03-0026-07

The Gender Discourse of Intellectuals and Its Social, Cultural Meaning from Late-Qing Dynasty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ZHANG Su-ling

(Leadership Study Department at the Pudong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of China, Shanghai 201204, China)

Keywords: nationality; gender; discourse of gender

Abstract: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by studying how the image of women was constructed in this period from late-Qing Dynasty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discourse on women's movement and to reflect women's histor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changes in "gender" discourse not only mean changes in women's social status in words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 but also relate to the fact that women entered into the discourse of intellectual discuss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Nationalism 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in gender discourse. Changes in women's image also related to a crisis in identity among elite intellectuals. Any change in "gender" discourse find roots in cultural processes.

性别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方式, 近年来,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已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的分析范畴。性别的建构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产物。^{[1]P88}性别规范无处不在, 其内涵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定义和构造,^{[2]P63-64}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 同一文化中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性别的具体规范也会发生变化。

从晚清到 20 世纪初期, 性别受到了异乎寻常的

关注。社会开始对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进行重新定位, 知识分子和民族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抑或说对现代中国的想像和设计, 伴随的是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倡导。从这一时期开始, 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并以其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体现在每一个女性的个体体验中。民族生存史上的巨大变迁使女性开始浮出历史地表, 并在时代的裹挟之下与时俱进。

作者简介: 张素玲 (1970-), 女,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研究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妇女史研究。

* 本项目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5002), 上海市教育科学项目 (B05053)。

这里的性别英文对应词是 gender, 而不是 sex。这一概念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已成为妇女理论的重要概念以及学术界重要的分析范畴。与 sex 相比, gender 更强调性别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

当然，如果我们把性别作为一个考察社会文化的重要变量，就会发现，女性形象的变化并不只是反映了女性在这个社会中地位的变化。由精英知识分子所发动的对妇女问题的论辩，与精英知识分子在自我认知与自我界定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关于女性的记载，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实际上也在向我们诉说着关于记载人的故事。因此，寻求历史记载的对象和记载历史的人之间的不确定的关系，注视那观看者看问题的眼光，分析关于妇女的性别观念、角色是如何产生的，如何不断被传播和形成为社会的内容，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将会使我们获得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更加丰富的内容。

一、寻找现代性：新女性的出现

鸦片战争瓦解了中国流行数千年的“天下”的观念，迫使中国进入基本上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了竞争的世界格局。来自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在晚清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中萌芽。尤其是到了戊戌变法前后，民族主义开始作为历史力量崛起，成为有着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中国也从而踏上了变革图强与追寻现代性之路。

现代性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动荡不定的社会中，社会精英人士本身经历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变化，并痛切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状况之不稳定、国家主权之脆弱。这与历史上曾不断上演的政权更迭与朝代转换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人的时间与空间的观念这时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正是这种状态引发了他们特殊的、与传统知识分子在社会和民族危机之时大不相同的焦虑。由于其坚定信奉的世界观的崩溃，维护传统秩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腐败，使他们比任何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更具有一种毁灭性的精神困惑，开始成为这一社会中疏离的群体，不是传统的传承而是变革成为这一时代的最强音。

于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主张，其中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以建立强盛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这个现代国家应采纳侵略者的方

法，以此来挫败他们的殖民扩张。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在知识分子中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为系统的思想体系。

这种新的历史观来自于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是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遭遇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历史观、世界观。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而这种进化史观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欧洲为中心、为历史发展的准绳，来界定文化间的等级差异，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国是“先进文明”，与此模式不符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则是“不开化的野蛮”国家，殖民行为被解释成“文明”对“野蛮”的驯化。除了“文明与野蛮”、“高级与低级”的等级性界定，进化论也是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普遍论，各国各民族多样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形态被抹去，以欧洲的社会发展历程作为惟一合理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尽管这种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启蒙话语，激励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与侵略，并在今天越来越受到后现代理论家的批判，但是在20世纪之交的中国，却成为激进知识分子们的普遍信仰。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这种进化史观就被不断介绍引进中国，对近代中国人的历史观、世界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近代以来产生的大量文本中可以发现，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梦想就是要达到欧美模式所界定的“高级”或“先进”文明形态。这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而且被社会精英付诸实践，改变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

正如李欧梵所说，这一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时间体认方式，即“今与古成了对立的价值观，今被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它将和过去断裂，并接续上一个辉煌的未来。”^{[3]P54}新成了一种价值追求，从晚清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观，再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新文化，新这个词几乎伴随着旨在使中国摆脱西方侵略、成为一个现代的自由富强的民族而发动的每一场社会和知识运

葛兆光认为，中国从“天下”成为“国家”的历史过程尽管在明代已经开始，但是，在观念世界中却要等到晚清时代才真正显出其深刻性来。由于战败的耻辱而导致的对整个文明信心的崩溃，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反思传统文化。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尽管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担忧西方文明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破产，然而，几乎所有持激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依然相信这种现代性观念。梁启超在其后来的《欧游心影录》中虽然也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失望，但是，在早期，他却是这种现代性观念的忠实信徒。我们只要从他的《新民说》中就可以窥见一般。参见黄敏兰：《梁启超》，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新民说》载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动。而新的参照就是西方文明，它是中国社会正在努力追赶和希望实现的。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观念、实践以及日常生活中普遍把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文明。

当然，形形色色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所要寻求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在许多人那里，现代性是一个蕴涵着复杂内容的目标，它包括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时，他们认为也必须对文化习俗、性别观念进行彻底的检讨和修整。因此，从晚清到20世纪初期，性别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这一时期在性别、婚姻、妇女、妇女教育等方面的大讨论与界定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常常运用性别来比喻中西方的关系，或者把妇女问题作为新的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性别观念也因此成为文明进化的象征与历史书写的隐喻。例如，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他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序中曾写到：“本书则以各国女人之地位，与其看待女人之法，为比较教化优劣之定格，此即之名所由取，亦即可称为万国古今教化之论衡，又即可使读是书者，得以自证中国教化所至之真地位也……全书之宗旨，可用两言以蔽之：一曰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一曰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使成其材，决不能有振兴之盼望。”^{[4] P824}

林乐知素来以“振兴华人，启迪女学”为己任，他的所谓万国古今教化之论衡就是把世界分成三等：未教化人（非洲人）、有教化人（东西亚）、文明教化人（欧美）。无疑，林乐知的语言带有浓重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一观点却在当时及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普遍的共鸣与认同，并随之出现了关于妇女问题的“众声喧哗”。

当然，当女性成为新的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时，在这一新的历史图景中，女性形象也开始成为一个动态的不断被建构的概念，随着讲述她的人之不同，它充满了多种可能性，被赋予了变动的多重性的意义。

二、精英知识分子关于女性问题的论述

（一）晚清精英知识分子关于女性问题的论述

1. 维新知识分子的性别话语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朝野震荡，真正的民族危机感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维新图强的强烈欲求，妇女问题正是作为强国保种、民族存亡的问题开始在

社会上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中激起了更强烈的讨论。

一方面妇女遭到猛烈的抨击，“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无学始”，^{[5] P37-44}另一方面，妇女也成了民族国家振兴的希望。维新知识分子的代表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大需要每一个人都是生利者，而中国妇女无一生利之人，全部仰仗丈夫供养，“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5] P37-44}二万万男子生的利，让另一半不劳而获的人口给分了，这个国家怎么会强呢？且在维新知识分子看来，女子身体瘦弱，无学无识，无法生养健壮聪明的后代，“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胫弱纤缕，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流此弱种，犹可忧危矣。”^{[6] P336-337}因此，维新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废缠足、兴女学。从女子教育的培养目标上，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明确提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以这种思想为指导，戊戌时期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的宗旨就是：“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7]

从表面上看，“贤妻良母”的话语似乎和清初以及其后盛清时期的学者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如出一辙。例如，清朝学者唐甄（1630-1704）就认为，女子无论在家还是在社会中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曾说：“人若无妻，子孙何以出？家何以成？孥则孰案？居则孰辅？出则孰守？”^{[8] P191}但实际上却有着本质不同。在前清学者与官员那里，他们生活的年代，中国依然是天下，他们寻求的更多的是家庭和谐而不是如何变革。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已不复盛世景况，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关注的是国家的强盛，妇女不只对家而且对民族存亡有着重要意义，妇女无论是从肢体上还是在精神上的变化都是国家和民族富强的重要基础。把妇女带入民族国家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男人并没有希望在家庭中寻求稳定，相反，他们呼唤家庭和国家的变革，以使中国在现代世界中能够与列强竞争。

如果从更深的文化与社会背景来看，这时的梁启超已经开始接触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他系统的了解这一思想并把他介绍给国民还是在被迫流亡日本之后）。在他以及同时代的改革者看来，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国要想在此生存下去，只有让自

己国力富强,人种强健起来。正如严复在《原强》中开宗明义,国家的强弱决定于其人民“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亦即“力、智、德”三者的强弱高下。^{[9]P85-122)}这种观念使他们开始日益反思传统文化,也开始把西学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记江西康女士》中梁启超向人们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一位新女性。文章以形象生动极富激情的语言极力赞扬了一名年轻的女子——康爱德,该女士刚从美国墨尔斯根大学学成归来,“无他志念,惟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自发大心,为二万万人请命,思提挈而转寰之”。^[10]在梁启超看来,正是康爱德在美国所学的“语言文字、天文、地志、算法、声光化电、绘画、织作、音乐之学”这些西方学问和现代教育,使康爱德成了一个与大多数中国女子完全不同的人。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梁还特别提到了盛清时期文坛上颇得文人赏识、具有才名的女子梁端、王照圆,不过,与对康的大加褒奖相比,梁的批评彻底而明确:“古之号称才女者,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若此等本事,本不能目之为学”。^{[5]P37-44)}一个新女性,两个旧才女,新与旧的强烈对比就这样成了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个注脚。

2.激进知识分子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

20世纪初期,妇女和现代性的关系呈现出了越来越热烈的讨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女界钟》。此书1903年一经出版即在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作者金天翮以富于感染力的语言与鲜明的对比手法,抨击禁锢妇女的传统伦理道德,提出妇女应该挣脱封建束缚,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他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已传进中国,像是一线阳光射进了古老黑暗的中国大地,但中国妇女界仍处在沉沉黑狱之中,他要唤醒二万万女同胞,敲响女界革命的警钟。文章开篇以男人的感伤开始,向我们叙述了一个南方梅雨时节,在他那狭窄的斗室里,他困倦的生活和内心强烈的渴望。“梅雨蒸人,荷风不来,长林寄寄,远山沉沉。立于不自由之亚东大陆国,局处不自由之小阁中,呼吸困倦,思潮不来。欲接引欧洲文明新鲜之天空气,以补益吾身。因而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烟卷,手榔仗,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自在!”^{[11]P1)}

金天翮的感伤是当时中国政治与经济危机的体现,他痛切地感受到中国正在遭受欧洲列强的入侵

与威胁,同时又对西方充满了向往,在他看来,西方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行为、婚姻还是他们所身处的城市,都在表明他们是何等的优越、自由、潇洒和浪漫,与之相比,自己则是思绪困顿、生活局促,所以他埋怨自己身处不自由之亚东大陆。

在金天翮的思想框架中,西方社会的女子是享有与男子同样自由平权的人,女权的种子已如春风吹拂,遍被女人。而在其同胞这里却是“魂怯弱,品性狷廉。”文章最后,他用充满渴望的语言表达自己对西方生活的向往之情。“我瞻西方,吾眼将花,吾心醉矣!”^{[11]P80)}

基于中西强烈的对比,金天翮提出了新的女性构想。与梁启超不同,他关于新女性的论述则显示了对女性的革命要求。在《女界钟》中,金天翮对“新女性”提出了规范,他反对把女子培养成相夫教子的良妻贤母,认为应把女子培养成革命的新人。他呼吁受教育的女性应成为:一、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11]P45)}

总之,在金天翮对20世纪新女性的展望中,打破了儒家传统中贤妻良母的规范,着力提倡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进入公共领域,发挥“女国民”作用,成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力军。他所鼓吹的女界革命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也很有震撼力,对当时一些希望打破社会性别藩篱的女子有相当大的激励作用。辛亥革命时期一批激进女性投身革命活动即是例证。

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要求女性直接介入救国革命并不意味着提倡女性反叛宗法家庭中的性别规范和角色,即便当时那些革命的女性,虽然自身充满了对女性及其家庭角色的排斥,积极参与民族革命活动,但也极力主张女性要肩负家庭和国家的双重职责。如这一时期的秋瑾。她拒绝接受传统的家庭角色,积极认同男性气质,希望跨越性别界限,进入男性空间,实际上,即是通过否定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获得男性性别身份来为自己对传统家庭职责的逃逸寻找合法性。但是,与此同时,伴随她的是紧张和压力,她是孤独的,她的悲剧人生故事可以用来解释她们的孤独。从秋瑾身上凸显了她所处

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境遇。

(二) 五四运动时期的性别表述

如果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抨击的目标主要是时局、政治制度,很少将抨击的触角触及到儒家传统道德,特别是宗法家庭内部,那么,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号下,大力抨击的则是传统社会制度与文化习俗,并以此视为改造社会的突破口。运用同样的逻辑,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首先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妇女问题,把妇女的解放看成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启蒙知识分子看来,女性的解放代表了现代文明的趋向,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方向。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认为,宇宙间的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发展变化,任何一种学说或是一种生活状态在历史的变迁中都会逐渐失去其效力。基于此,陈认为儒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儒家关于妇女的道德规范必须彻底改变。他指出,西方妇女过的是一种自由文明的生活,她们独立,可以自由择业,也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婚姻。但是,中国妇女则是依赖于他人,过着被人豢养和不自由的生活,严格的性别隔离使她们不能自由社交,也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她们的精神和肢体倍受摧残。无疑,在陈独秀看来,西方妇女的生活和行为代表了现代文明,如果中国社会朝着更高的文明阶段发展的话,孔子之道下中国妇女的生活状态必须改变,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12]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性别问题很快成了新文化运动探讨的重要问题。在随后几年里,这一思想也得到了其他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广泛响应。不久,就以《新青年》为阵地,展开了对妇女问题与社会改革的大讨论。1918年陶孟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女子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陶谈到西方女性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她们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精神在欧美社会中弥漫磅礴,使一

般女子无论是居家还是在外求职业,无论是为人妻还是为人女,都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这种精神。当然,陶认为,促使妇女问题和新女性出现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变迁,经济的发展使女性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职业,从而摆脱了传统的羁绊;教育的普及使女性有了与男人一样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开阔了眼界,从而从小家庭走入社会的大舞台;思想的发达鼓舞了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与此同时,陶还认为国人应该对女子问题有一个新的眼光,要以欧美为前车,因为这是世界潮流,不必抗拒也不能抗拒。尽管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职业和思想远逊于欧美,中国社会制度下的女子还没有奋发策励的机会,但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乃交通频繁之世界,经济、职业、思想之发展,无不遍布于全球,成世界的潮流。现于欧洲今日之社会者,明日即将现于吾族之社会,今日欧美之女子问题,必将速见临于此邦,无俟疑惑。至于预俟其来,谋解决之方,则责艰任重,匪一人任。要在今日之青年,而尤在今日之青年女子。”^[13]

显然,陈与陶的观念是自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普遍的一种思想。他们深受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影响,相信进化论,渴望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去。基于这种世界观与历史观,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因此,为了提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必须有意识地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重塑自己。在他们看来,中西方社会生活中一个鲜明的对比即是女性地位的不同,因此,女性的形象与生活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妇女得到解放,中国也才能被认为是达到了现代性。参照西方探讨中国妇女问题是新文化时期的知识分子渴望努力推进中国现代性的重要一部分。

虽然与晚清知识分子相比,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话语更多强调的是女性个性的解放,女性人格独立开始受到较大的关注。但是,假如从妇女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上看,晚清以来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实际上是一脉相承、殊途同归。如果说维新知识分子是提

秋瑾生前那帧着男装的照片以及照片上那首自题诗:“俨然在望此何人?侠骨前身悔寄身。过世形骸原是幻,未见境界却疑真。”诗中流露出的那种对身为女性的懊恼,对男性世界的渴望,就足以透露出诸多信息。她的死甚至也是她公开反抗自己性别表现,按照惯例,女罪犯应该是被施以凌迟或者绞刑,然而秋瑾是像男人一样被斩首的。尽管秋瑾要冲破自身性别局限的努力以及她的英雄使命感使她投入到政治活动和革命事业中,但是她后来那充满了挣扎的诗作却显示出她充满张力的内心世界,由于她所选择的生活道路带来的孤独和不能实现抱负的沮丧,悲哀一直伴随着她。秋瑾:《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倡妇女通过做好贤妻良母来承担对种族、国家的职责，激进知识分子希望妇女直接投身革命来贡献国家，那么，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则认为妇女人格独立的主要目的即是奉献社会。因此，民族主义一直是晚清以来性别表述的主旨所在，在妇女解放的话语中妇女并没有作为独立的权力主体，而只是作为与民族休戚相关的问题，一种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亚洲国家如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往往把妇女或新女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关于现代女性的话语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象征意义，是新的国家建构中的一个部分，是国家或进步知识分子阶层政治愿望的体现。如果说在这种话语中，现代女性和她们的前辈有所不同，那也是由于男人所追求的社会变化和想像的结果，面临考验的是男人的态度和行为。正因为这样，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变化就成了男人在关于民族国家问题中争论的焦点。^[4]

三、性别话语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如果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晚清以来关于妇女解放的性别表述不仅是整个民族国家主体认同的符码，而且其背后还蕴涵着复杂的男性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问题。妇女解放之所以激起了知识分子热烈的讨论，不仅仅是由于民族主义的要求，也反映了男性知识分子无意识的身份认同的危机。

挫折感来自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在西方侵略者以及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当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处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时期，对雄性、男性化的理解也正在经历一种变化，对所谓真正的男性力量的崇拜被认为是这个竞争的社会中取胜的惟一工具，社会达尔文主义渗透在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的生活中。在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中还渗透了性别关系的隐喻，即西方代表了男性的权利和力量，而东方国家则是屈服于西方殖民侵略和权利的阴性，它被征服、拥有和占领。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妇女成了落后软弱、失去主权的中国国家的象征。从晚清康梁等人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这种叙述。妇女常常不是作为与男性相对的另一性别，而是成为表征一种需要转变的落后、衰败、丑陋状态的符号。在梁启超笔下的中国是“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5]

由于此时的欧美女性正在从男权中解放出来，妇女解放运动在西方轰轰烈烈的进行，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也把他们自己视为要挣脱西方男性化的控制。从这一方面来说，新女性实际上是一个隐喻，代表了他们自己从从属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的愿望，表达了知识分子在当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话语中焦虑的心态，^{[6]P26} 通过描述女性来表现自身的困境和焦灼。女性形象因此而成了一个象征，通过她，男性知识分子来确立自我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表达自己的问题与焦虑。

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还是由于其边缘地位造成的，这种状况尤其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更为突出。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历来具有一种优越感，他们是知识资源的拥有者，通过国家的考试制度进入官僚机构，成为社会的精英分子。这使他们比其他的团体对于社会政治更加敏感与关心，这也使得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地位，认为在国家事务上具有重要的使命。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取消了他们进入社会主流的途径，传统入仕为官的道路断绝，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能藉由传统的道路来谋求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使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地位，感到人生远景模糊不清，也因此成了儒家社会制度的强烈的抨击和变革者。这种事实使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成为改革家、革命家。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通过提倡民族国家的利益，通过受压迫的社会群体——妇女（当然，这种思想和行为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无意识），来表达自己的疏离与挫折感，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提倡和代表她们，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找到了一种优越感，他们成了女性精神和行为上的引导者。通过提倡妇女解放，精英知识分子从文化上满足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这个受压抑的他者，他们开始确立自己的身份。

此外，中国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家族制度使男性知识分子感到压抑。在封建大家族制度中，不仅有社会性别的等级，女性普遍受到男性的控制，男尊女卑成为社会的性别价值观念，而且还有辈分的等级，在父权制度中受压抑的不仅是妇女还有青年男性。然而，和他们的父辈不同，由于在新的环境中接受现代教育，使他们开始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也培育了他们的独立意识。但是现实生活中传统又在不时压迫着他，使他们开始对于旧的

伦理道德感到厌倦和憎恨。于是，他们开始了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反抗和批判。

因此，当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号”，大张旗鼓地宣传易卜生主义时，与其说是在倡导妇女解放，毋宁说是男性知识分子自身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中的呼喊，是他们反抗旧家庭桎梏的宣言。也正是这样，娜拉成了一个当时男女青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热烈讨论的话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娜拉说：“我相信我第一要紧的是，我是一个人，一个同你一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得努力做一个人。”这种个性的觉醒对于在封建大家庭的束缚中没有个人意志与自由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他们反抗封建专制和奴性道德的武器。娜拉的形象实际上不仅代表新的女性，也是五四运动时期男性知识分子要求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的一种呼声。

总之，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提供给了精英知识分子一个广阔的空间，令他们激扬文字，抨击时弊，构想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计划。与此同时，知识分子自身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使他们存在着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

景中，女性进入了他们的话语结构，并成为建构民族国家和个体身份的重要符码，产生了激烈的社会性别的争论与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

可以看到，女性已不仅仅是无关宏旨的人们籍以区别事物的一个基本性别符号，它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对于那些精英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改革者而言，妇女问题是区分中国与西方、文明与落后、现在与将来的标准，他们藉由妇女问题讨论他们自己正在面对的问题、他们的恐惧、他们应着手做的事情以及他们前瞻性的设想。所以，无论是传统的还是被重新定义的妇女形象都不只是妇女自身，而是被赋予了其他的内涵，并不可避免地和当时的文化、民族、种族的重新建构甚至是全球的文化政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虽然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使女性冲破传统的性别藩篱，从而走向广阔地社会舞台。但是，作为性别主体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独立与自主并未进入这一话语主体的视野，从而也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留下了诸多问题。

[参考文献]

- [1]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2][英]彼得·伯克著,姚明,周玉鹏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3]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4]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
- [5]梁启超.论女学[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6]康有为著,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J].女学报,1898,(9).
- [8]雷良波等编.中国女子教育史[C].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
- [9]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 [10]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N].时务报,1897-2-21.
- [11]金天翮.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2]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J].新青年,1916,(4).
- [13]陶履恭.女子问题[J].新青年,1918,(1).
- [14]Louise Edwards. Policing the Modem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J]. Modern China, 2000, (2)
- [15]梁启超.新民说五[J].新民丛报,1902,(1)
- [16]Wendy Larson.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责任编辑:伊鸣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四卷六号出版“易卜生号”,刊登了由胡适译介的挪威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傀儡之家》。